

中国古典文学名作鉴赏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作鉴赏丛书

殷维刚 梁宗奎

# 先秦散文英华



62

中国古典文学名作鉴赏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作鉴赏丛书

## 先 秦 散 文 英 华

殷海刚 整理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9印张 222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329-0945-2

I·42 定价 3.10元

##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光彩夺目的作家和作品。中国古代散文是中国文学历史宝库中的珍品，而中国最早的散文，便是《尚书》的《盘庚》篇。这是商代的统治者晓喻臣民的一篇文告。其中运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火之燎于原”等。这些生动的语言，有的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里。这是奴隶制时代的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长流的开端。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这场变革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引起了复杂的变化和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和“处士横议”的局面，从而产生了《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同时，由于诸侯之间频繁战争，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斗争，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

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就表明，世世代代的统治者，都很注意记载他们活

动的历史，但是最初的史书非常简略。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史料的积累和丰富，随着书写工具的改善，为历史家们撰写史书提供了必要条件。巨大的社会变革又促使了历史家们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评价。历史散文注意运用当时的口语，讲究语言的表现力，使古代散文由简单的文告摘录、大事纪要的形式发展到长篇巨制；在叙事中表现人物的言行，描绘历史人物的不同特征。从《尚书》、《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体现了古代历史散文发展的脉络。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西汉以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书，全面地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左传》大量记叙了春秋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了奴隶社会崩溃时期的重大变化。作者生动地记述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列国兼并、奴隶们的反抗、奴隶主的压迫、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

《左传》的作者突破了神权至上的传统观念，强调了“民”的历史作用，突出地表现了“民本思想”。如随国的季梁曾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楚国的史嚣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曹刿在齐鲁大战之前告诫鲁庄公说：战争的胜败的关键是取信于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跟着国君去死战。至于神灵的保佑，贵族的支持，那是次要的因素。上述三例表现作者已经清醒地看到，只有取信于民，国家才能巩固，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左传》的作者一方面肯定人民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

无情地揭露、批判了那些肆意残害人民的贵族统治者。如在宣公二年里记载了晋灵公的残暴行为：“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宰夫胾熊蹯不熟，杀之，置诸肴，使妇人载以过朝。”作者还借司马子鱼之口谴责宋襄公用人祭祀的行为，（僖公十九年）又通过“君子”的口指出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作殉葬的残忍行为。（文公六年）

《左传》的作者在憎恶那些荒淫残暴的统治者的同时，热情颂扬了那些正直、有作为、有真知卓见的政治家。他以浓重的笔墨记叙了政治家子产治理郑国的功绩，表现了他的杰出才干、超群的谋略和政治远见，赞扬了他那巧妙的外交艺术。襄公三十年记述郑人对子产的赞美：“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左传》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是一部颇有艺术特色的文学作品。

《左传》的作者善于描写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生动地刻画这些人物的性格。书中记叙了晋公子重耳出亡的一段经历，突出这位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气度。如僖公二十三年载：“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这位亡命于途的晋公子重耳，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向种田的野人乞讨，农夫送给他土块，子犯竟巧妙地利用这件事鼓励重耳，说这是上天赐给他土地的征兆，使重耳从暴怒中清醒过来，郑重地稽首行礼，煞有介事地把土块载于车上而去。作者把一个机智权变的霸主的非凡气度活现于人们的眼前。

《左传》的作者善于描写战争。全书记述了近四百次大小不同的战争。作者能从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中，抓住关系到战

争全局发展变化的脉络，写明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有条不紊地叙述战前的准备和谋划，战争中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消长，战争的结局和教训。在叙事中穿插细节的描写，刻画关键性的人物。把惊心动魄的战争，写得有张有弛、千变万化、曲折动人。象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齐鲁长勺之战都写得有声有色，各尽其妙。

《左传》一书，生动地记述了行人的辞令。春秋之际，诸侯之间为了某种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常常派遣谏于辞令的行人（外交使节）开展外交活动，通过外交的手段，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僖公三十年记载，秦晋联盟围攻郑国。郑国在危急之际派烛之武使秦。烛之武以“焉用亡郑以陪邻”的利害关系，瓦解了秦晋联盟，使秦王心悦诚服地退了兵。烛之武受命于危难之中，竟能不辱使命，就是依仗委婉动人的外交辞令而达到瓦解敌国保存自己的目的。

《左传》具有完整的记事，丰富多彩的内容，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生动精练的语言，是我国历史散文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赞美《左传》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影响很大，它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史实，注重文彩，故事性强，在叙事中表达了司马迁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些都是《左传》给予他的巨大影响。从《左传》到《史记》，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散文的一条优良传统。

《国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全书是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分国编为二十一卷，记叙了大约五百余年的部分史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太史公肯定《国语》是左丘明所作。也有人

认为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人依据各诸侯国的史料整理而成的。

《国语》并非全面系统地记述各诸侯国的历史，而是侧重记叙了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反映了各国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晋语》就侧重记述了晋文公称霸于诸侯的情况及晋国几大贵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国语》受了《左传》的某些影响，比较重视“民”的力量，反对残暴不仁的君主，批判统治阶级淫逸的生活。但是《国语》中的消极成分也是相当严重的，作者时常表露出忠君观念、宣扬天道鬼神、预言吉凶祸福。这都是作者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与唯心史观的反映。

在文学成就上，《国语》远不及《左传》。其语言文字质朴平淡，但有些篇章记叙了生动曲折的情节，生动地描写了某些人物，特别是《晋语》中写骊姬用阴谋杀死太子申生的故事，骊姬用夜半而泣的手腕打动晋献公，乘机向献公进谗言等细节描写，虽是作者想象之笔，但写得生动传神。作者把晋献公的昏聩愚妄，骊姬的口蜜腹剑，申生的软弱顺从，维多肖的昏聩愚妄，骊姬的口蜜腹剑，申生的软弱顺从，维多肖地描绘出来了。在《越语》里，作者又生动描绘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报仇雪耻的形象。描写了范蠡、文种等人深谋远虑的才智，广大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这些特点给后世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国策》是一部按国记事的历史著作，记述了从战国初期到秦并六国之后的大约二百四十年间的历史。它的作者已不可考，最初可能是战国末期或秦汉间人汇集了有关的史料编纂而成的。有人疑为蒯通。西汉末年刘向作了整理加工，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分史三十三卷，定名为《战国策》。曹魏之后其书散佚。宋代

的曹巩访求原书，重新核订，成为流传到现在的《战国策》。

《战国策》又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历史散文。它生动地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论与活动。这些人利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形势，游说诸侯，提出某种政治主张或斗争策略，运用权谋，活跃于政治舞台。有的以巧言和“雄辩”陈述形势，分析利害，用动听的辞令打动国君，以便左右形势，猎取高官厚禄。有的策士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顾信义，不择手段，朝秦暮楚，摇唇鼓舌于各诸侯之间。苏秦、张仪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苏秦本来是主张连横的，因说秦王失败，才转向东方六国宣传合纵抗秦。有人攻击他是“天下不信人”。他竟厚着脸皮对燕王说：“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不能为燕谋利，“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燕策·人有恶苏秦于燕王章》）他竟公然地招认自己的不顾信义的行径。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战国之际的一些纵横家们的精神状态。纵横家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张仪，为秦出使于楚，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为诱饵，诱使楚国与齐国断交。当楚怀王派使者至秦索地时，张仪却改口说只许给楚国地“六里”。（《秦策·齐助楚攻秦章》）张仪完全是用政治欺骗的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虽然得势于一时，但在天下人面前，却彻底暴露了其政治骗子的嘴脸，依靠行骗而取得的东西，难道也能持久吗？

《战国策》一书中，表现出许多进步的倾向。“以民为本，以君为末”便是重要的一条。象赵威后问齐使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

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这种“以民为本，以君为末”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是进步的。此外，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旧制（《赵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触龙说赵太后（《赵策》）等，都具有某种进步的思想内容。

《战国策》的内容相当驳杂，思想倾向也不完全一致。象“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豫让，意在收买人心并为孟尝君营救“三窟”的冯谖，虽是竭力报效知遇之恩，但在客观上是做了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雎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阖的直叱“王前”。在这些作品里，既反映出士的地位的提高，也表现出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战国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说事。无论是个人陈述还是双方辩论，都用淋漓酣畅、夸张渲染的艺术方法。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艺术魅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秦策一），都具有夸张渲染的艺术特色。这些策士们在估量形势、分析利害，都相当细致准确。纵然有不尽可靠的地方，但以纵横家论事的本身而言，实在是不失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这就使历史散文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战国策》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生动地描写人物。作者成功地描绘了苏秦、张仪等策士的形象；又生动地塑造了荆轲、鲁仲连、聂政等敢于反抗强暴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这些人物莫不相栩如生，维妙维肖，深深地铭刻在千千万万的读者的心里，给人们以无穷的启迪。

《战国策》中的文章，多成于战国末期，因此，它比战国

初期出现的《左传》，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提高。《左传》一书的语言严谨简约，所记行人的辞令委婉曲折，温文尔雅。而《战国策》一书的作者非常讲究铺陈，语言流畅又富有文彩，所记游说之辞笔锋犀利，夸张渲染，具有雄辩的色彩。通过形象的比喻和妙趣横生的寓言故事说理论事，从而产生发人深省的艺术魅力。因而《战国策》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散文兴盛繁荣的另一重大成就，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辉煌灿烂的诸子散文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奴隶社会逐渐解体，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周王室东迁之后，周天子的统治地位逐渐崩溃，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文化学术自由争鸣的气氛空前活跃。诸侯卿相中的有识之士，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扩大其政治影响，壮大其势力，以礼贤下士为号召，延揽天下人材。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都争相养士；秦相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号称三千人。可见当时养士之风之盛。这些依附于诸侯卿相的士人，在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或以学者的姿态或以政论家的面貌出现于社会的舞台上。他们的身世不同，思想各异，对社会上各种问题的见解各不相同。他们从各自的阶级或集团的利害出发，比较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了扩大他们的思想影响，有的奔走列国，游说于诸侯之间；有的著书立说收徒讲学。于是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学派。各学派之间以及各个学派内部，可以自由地各抒己见，自由争论。周天子无力控制思想领域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各个诸侯国更无力去统一天下的各种思想流派。“士”民中一

些杰出的思想家们，可以依靠他们的影响，依违于各诸侯之间，自由地阐述他们的思想主张。这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造成了难得的自由争鸣的政治局势，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又进一步活跃了自由争鸣的学风的发展。于是为先秦诸子散文的兴盛和蓬勃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这块沃土上产生了丰富多彩而又辉煌灿烂的诸子散文。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先秦诸子归纳为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在先秦诸子的各种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春秋和战国之交产生的《论语》和《墨子》为代表。《论语》一书中的多数篇章，是属于语录体散文。其中的个别篇章如《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不仅篇幅较长，结构完整，而且周旋为传神的对话，表现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为人性格、神态和语气。《墨子》一书在对话中杂有议论，已经初具说理文的一些特点。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孟子》一书仍然较多地保留语录体散文的特色，但它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而《庄子》一书，只有少数几篇仍保留了对话式的语录体散文的艺术特点，其中的多数篇章已经完全发展为专题的议论文。第三阶段则应当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篇幅大大加长，结构完整，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讲究文彩。这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已经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行的“回忆录”。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最早的一部语录体散文。书中所记孔子的言论，颇有格言的意味，包涵深刻的哲理，阐述了孔子对治国、为政、做人、治学、仁、爱等各种问题的深刻理解。其表现形式都是三言两语，互不连贯，独自成篇。因此，人们读《论语》的时候，时常有一种突然而来忽然而至的感觉。这种格言式的语录体散文，正是当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粗陋的书写工具的一种反映。

《论语》一书，虽然只记述了孔子的片言只语和某些生活行为的片断，但是读者仍然可以从中间理解孔子的思想感情，想象出孔子的为人和形象。他非常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热心于当时的政治活动，先后周游了宋、卫、陈、蔡等国，劝导这种诸侯施行仁政，宣传他的“礼”、“义”、“仁”、“德”、“爱”等思想主张。可是当时的诸侯中既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也没有人接受他的主张。他是在到处碰壁之后，才失意地回到鲁国，着手整理古代典籍并收徒讲学，他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把文化知识传播到平民中间，开创了私人著述和讲学的新风。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可是，孔子生前既未得志，也未腾达。而是在他死后的若干世纪之后，才被一些封建帝王抬到吓人的高度。那些封建帝王们争先恐后地“奉承”孔子，大搞“尊孔”和“读经”之类的活动，并非真心实意地信奉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是把孔子立为一尊偶像，作为他们欺世盗名的幌子。这大约是孔子生前做梦也不曾梦到的悲剧！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思想，是孔子之后最有权威的儒学大师。《孟子》一书基本上是孟轲本人的著作，因而全

书的风格比较统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它的文学成就和影响是非常突出的。

“民为邦本”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仁者无敌”，“得其民，斯得天下”。因而他竭力宣扬“仁者无敌”的思想，主张以“王道”和“仁政”治理天下，反对“霸道”。而修身养性、推己及人是仁者的思想基础。他猛烈地攻击不知爱护天下百姓的封建暴君，说历史上的纣王是个暴君，是个独夫民贼，理应受到人民的诛灭。他揭露梁惠王的本质同其它的暴君一样，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并无根本的区别。他斥责梁惠王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接近他看不见令人尊敬的地方）焉。”他斥骂那些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大臣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孟子》散文显著的艺术特色，是那种雄辩的不可遏制的气势，处处显示出“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声势。后世的许多文学家都盛赞《孟子》的文气。宋代的古文家苏洵赞美孟子的文章“其锋不可犯”。苏轼也说：“孟子曰：‘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孟子常常以高超的论辩技巧，在不知不觉之中把对手引导到自己否定自己的结论上去，使对手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孟子》散文大量运用妙趣横生的比喻。把许多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说得生动形象，使读者一目了然。例如“缘木求鱼”、“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的比喻，具有生动形象、妙趣横生的艺术魅力，至今仍然被人们广泛的运用。

从《论语》到《孟子》，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巨大飞跃。

《孟子》虽然还保留语录体散文的某些痕迹，但它已经发展成长篇大论的散文了。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两代的古文家，莫不讲究学习《孟子》散文的艺术风格。可见其在散文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了。

荀子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对春秋以来的各家学派都给予批判和总结，建立了一种儒法兼有、礼法并用的理论。荀子思想中的精华之一，是他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否定了天命鬼神的存在，所以他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指出自然界的变化是依据自然本身的变化规律运行，并不因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天”不能决定人世间的治乱兴衰和吉凶祸福。从根本上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天论》一文中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可见他主张利用大自然来为人类的社会服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把关于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荀子在认识论上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强调后天的学习对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的一切真知卓见，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只要善于学习，后人就有可能超过前人。所以他在《劝学》一文中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除了学习之外，荀子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又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可见荀子非常重视人的后天教育，认识到学习和客观环境对人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的。他以性恶论去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脱离了人的阶级性去谈人性。这就同孟子一样，

陷入了抽象的人性论。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一位儒学大师，学识极其宏博。他的散文多为长篇议论文，论点明确，说理透彻，结构完整，句法整齐，用语准确，逻辑严密，讲究词藻文彩，他把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墨子是战国初期的鲁国人。生卒时间不详，大约略晚于孔子。他早年学儒，后来抛弃儒学，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学派注重实践，不注重文彩。所以墨子的文章质朴无华，注重说理，尤其重视论辩的逻辑性，创立了“三表”法。这就是立论时，一要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要揣度民情，了解现实；三要检验效果，考察实际的应用。因此，墨子的文章论证严密，议论透彻，行文条理畅达明快。这些艺术特色在《非攻》等文中显示了出来。

墨子的散文，对后世说文的发展颇有影响。他常常通过具体事例，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层层推理，使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墨子在《非攻》一文中，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入人栏厩，取人马中”是小“不义”的行为，进而推及攻人之国便是“大为不义”的行为了。词严义正地批驳了那种谓攻人之国为“义”的颠倒是非的谬论。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庄周。老子是生活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可是他却向往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庄子比老子更加憎恶现实中的一切。他讥讽儒者四处游说诸侯是无效的徒劳；也反对任何治世的药方。在他看来，人们只能“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就是“同与禽兽

居，族与万物并”的人兽杂居的蛮荒时代。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实行“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治。庄子则进一步否定一切，反对一切人为的治世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人们“素朴”的本性。可见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认识论上，陷入了没有是非标准的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的泥坑。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表明老子不仅明瞭事物的矛盾与对立，而且他还明瞭矛盾的不停转化。老子的这些思想已经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而庄子则过分强调事物的相对性。他认为万物无所谓是非、善恶、大小、寿夭，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别和界限。庄子的这些虚无主义观念，正是没落阶级的厌世情绪的反映。他在《逍遥游》中，就表现出幻想忘掉现实世界、忘掉自我，追求一种“无己”、“无待”的境界；追求超乎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精神自由。这就是庄子的理想境界。

从否定一切的观念出发，庄子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他在《法篋》一文中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统治者所标榜的“仁义”的欺骗性。表现了庄子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态度。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构思宏伟，想象奇妙，汪洋恣肆，变化万端，有细歌传神的刻画，也有辛辣的讽刺，语汇丰富多彩。使具有深刻哲理意味的散文，成为形象生动的文学珍品。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又吸取了各家学派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韩非学说的核心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法、术、势三者必须巧妙结合并用，缺一不可：“若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韩非在《难势》一文中又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由此可见，韩非所竭力强调的便是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身上。他的这种理论，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

韩非的散文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锋芒犀利，议论透辟，论证事理，切中要害，也最能体现法家文章的艺术风格。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说：“他的头脑异常犀利，有时犀利得令人可怕。我们读他的《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吧，那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就是那不十分为人所注意的《亡征篇》，把一个国家可以灭亡的征候，一直列举出了四十七项。他那样的不厌烦、不屈挠、不急躁的条分缕析，分而又分，‘可忘也’，‘可忘也’，象海里的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不忌气地卷地而来，轰隆一声打上崖岸，成为粉碎，又回卷而逝。这和屈子的《天问》可以媲美。”郭沫若的这一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韩非的艺术风格。此外，韩非还善于运用史料和寓言故事，阐述人生的哲理，把抽象的哲理形象化。

综观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发展过程，可知文学的发展同当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尚书》到《春秋》以至《左传》、《战国策》，这是历史散文发展的路线。从《论语》、《老子》到《孟子》、《庄